

G. 史坦因著
賈曉輝譯

世界政变的展望

——
紅色中國的挑戰之九

晨社

世界政局的展望

—— 紅色中國之挑戰 ——

著因坦史·室根

譯 敬 翼

• 1946 •

世界政局的展望

——紅色中國之挑戰——

G·H·史坦因著

賈敏譯

出版者 農社
經售 各大書局

• 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第一版
版權所有

目錄

一	日本準備着東山再起·····	一
二	延安·莫斯科·和我們自己·····	一二

一 日本準備着東山再起

日本的軍閥們好像已經定好了一個計劃讓日本逐漸回到世界強國之列去，然後再來一次征服。這種話聽起來也許覺得玄妙；但是比較前幾代的日本軍閥們所定的建立世界霸權底綱領卻並不更來得玄妙：在一八五八年，堀田的綱領中就撮要地說過，必須怎樣利用西方的列強以教育和幫助一個弱小的日本，使它變得充分地強固起來，征服列強手中的世界；到一九二一年，田中奏摺里又有着侵襲珍珠港和其他領域的詳細指南。

日本的領袖們早已明白地認清了，日本在這次戰爭中的敗仗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們好像不甘自願地承認，這一個將要到來的災禍，就是日本光輝的七十年征服生涯的末日。他們覺得，在這一次的

戰爭還未結束之前，日本理應就安排好一個下一回合的計劃。

日本的新計劃集中於巧妙地利用中國來作爲日本軍國主義的東山再起。

這個計劃的先決條件是政治的——阻止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阻止中國獻身於人民所需的和平社會底進步，以及阻止中國與聯合國密切地合作起來穩定世界的和平。因爲這樣的中國對於日本的軍國主義是毫無用處的。

但是日本所需的也不再是一個荏弱的分化的中國了。相反的，他們必須想法幫助中國變得強固和統一起來——以一個把國內的力量導向軍事化，把國際的勢力導向擾亂新世界的平衡，把找尋同盟的企圖導向（無力傷害然而在潛力上非常有用的）日本底中國反動政權作爲基礎。

證之於周恩來在延安根據了截獲的文件所告訴我的話，日本人也許早已採取了實施他們計劃的第一個步驟了。他們好像早已準備好，在最後被逼着離開中國的時候，留下一支有力的第五縱隊。

這一支第五縱隊是由中國的傀儡組成的。它是爲日本人的第一個必要條件工作的——加強中國的反動份子。它將盡可能承繼在中國打了敗仗和投了降的日本軍所留下的武器，軍火，和接濟。此外，這一支第五縱隊是用來反對中國的共產黨的。

爲着闡明日本人的目的究竟何在，說一說中國傀儡們的政治性格是必要的。

中國被佔領區中的附逆份子，其成份是特別複雜的。到日本人的權力在中國崩潰的時候，要在無數和日軍共同工作了許多年的中國的政客，商人，地主中間區分出誰是化裝了的愛國份子，誰是無害的良民，誰又是日本人的真正的同盟，這是極端困難的事情。

等到愛國的中國要把他們復員或處罰的時候，在傀儡陣營的兩翼底極端，有許多情形是很清楚地不會引起問題，也不會有什麼爭論的。

化裝了的真正愛國份子不是沒有的，至少在下級的政治傀儡和下級的軍事傀儡中是如此。他們中間有許多已經替國民黨，尤其是替共產黨盡了很大的力，做了很有用的反日工作；他們中間有一些是在從事傀儡生涯的開頭就開始的，又有一些是在看到了日本人的必然潰敗之後也開始了。

相似地，在高級的政治傀儡中，有幾個已經罪惡昭彰，沒有希望僞裝他們自己了，他們中間有幾個甚至已給重慶的國民政府指出來承受審判。在重慶的外國新聞記者會議席上，政府當局發表過各種各樣的言論來回答我們所堅持的問題。但是政府的發言人對於附逆份子終是非常的不願說起。他們拒絕把要受審判的著名的傀儡領袖底名字宣佈出來。每一次他們都暗示說，在好像叛國的傀儡中間，有許多從前屬於國民黨的高級官員不能一概而論。

有許多軍事的傀儡在替日本工作着，他們不但不攻擊重慶的部隊，甚至還幫助國民黨在日軍後方反對中國的共產黨，主要的問題彷彿也將在那許多情形中發生。

在延安的共產黨領袖以及幾個從各戰區來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高級人員告訴我們，他們有絕對的證據證明：帶着部隊投向日本去的國民黨將領，實際上是奉的上使之命。在有些情形中，他們告訴我們，投向敵人去的命令實際上發源於重慶的軍事當局。在另外一些情形中，這些命令是由戰區司令或重慶政府軍在前線負責的長官頒發的。據共產黨說，在這些人投降之前，中日雙方對於那些部隊在任新傀儡務中的特殊用途還先行訂好了協定。

共產黨指摘說，在這後面，國民黨是有其一定的政策的——就是所謂「循環救國政策」。據共產黨說，這種政策在許多地區里是被公開地解釋着和宣傳着；舉例來說，在山東就是如此，這也許是由下面的考慮所決定的。

中國的民族救亡不但需要最後擊敗日本——這在西方列強的相助之下是遲早會得成功的；而且也需要打敗在抗日戰鬥中在被佔領區建立了有力陣地的中國共產黨。國民政府本身所須對付的也正是共產黨。

看到了共產黨不斷生長的力量，國民黨就認為必須使用——甚至在對日戰爭還在繼續着的時候——某些國民政府的部隊攻擊他們，以保持高於一切的民族救亡的利益。這樣的行動對於國民政府在『自由中國』或在國外的威信是沒有損害的，因為從敵後漏出來的新聞很少，而延安邊區本身又被堅固地封鎖着，與外界不通聲息。

適合於這種任務的第一類國民政府部隊，就是那些留置在敵後的。因為山、他們和自由中國的隔離，又由於他們不能如共產黨那樣地把他們佔領區內的人民的戰力組織起來，他們那種抗敵的用途是被破壞了。然而那些部隊的不能得到人民的助力也使他們在反對共產黨的戰爭中變得多多少少地無能起來了。

日本當局是願意把他們接受過來的，而且答應他們讓原有的司令官統率他們。日本當局願意接濟他們，重新配備他們，重新訓練他們，指導他們——唯一的目的是爲了要使他們繼續反共的戰爭；關於這，日本人至少一直是和國民黨一樣敏感的。

日本當局把類乎此的條件明明地提給了處於前線絕境以及抗日的戰鬪力被供應的困難和拙劣的領導減削了的國民政府的軍隊。

在延安看來這就是四十五萬左右的政府軍怎樣幫助日本人和國民黨反共的事實；這些部隊是原來的部隊，司令官和重要長官也是原封未動而且由日本人的相助加強了；他們不但與日本人有著連絡和合作，而且和戰線另一邊的國民政府的主要軍隊，甚至是和重慶政府本身也有連絡和合作。

這自然不可能證明國民政府的將領們究竟奉了誰的命令，根據了什麼理由帶着他們的部隊投向了日本，又究竟爲了什麼，他們在日本人的指揮之下打着共產黨；或者，在戰爭過程中投向日本去的政府部隊究有多少變成了日本人的傀儡。但是重慶政府的發言人幾次地承認了，某些著名的將領和他們

的部隊是被日本人「俘虜」去的，那些將領中有幾個常從日本的佔領地區向重慶廣播，彷彿他們已在傀儡陣營里居了要職，雖然「恐怕是被要挾的」；還有「一些」從前的政府部隊現在正在當着日本人的傀儡。

我至少知道有二次，重慶的軍事長官坦白地向協約國的人員承認，他們和各地政府血統的傀儡軍都有連絡和合作。這也是事屬有據的，因為那些部隊每天都在打着共產黨；但是從重慶的戰報上看起來，除了當地徵用的一些便衣人員外，傀儡軍彷彿很少被用來攻擊國民政府的軍隊的。

這就是為什麼延安要非常強烈地懷疑重慶對於「叛國大罪」的觀念。延安認為在日本被打敗的時候，重慶的那種觀念是不夠廣得去審判和處罰很多偽軍的軍官的。這些軍官也許會公開地被復員，甚至被發獎，甚至被併入國軍；然後再被用作反共。

原來重慶所稱的「循環救國政策」是要在日軍最後被逼離開中國的時候，一定要使忠於國民黨的部隊就會在敵後共產黨控制地區的四周出現。

那些長官和部隊在民族敵人敗退的時候，是會在那里的。看起來，他們還將是一股很大的力量。他們被認為營養比較好，訓練比較好，而且在現在早已比一般重慶的軍隊得到了更好的配備。此外，他們都被強烈地養成了一種反共和排外的意識。我在延安所看到的那些從日本軍隊那里截獲的宣傳資料，清楚地指出了敵人對於他的傀儡，特別着重以反動的國民黨意識為基礎的反共和排外的教育。對

於蔣介石將軍的指摘是避免的，或者僅限止於批評他那『使重慶倚賴了亞洲人民的西方敵人』的政策。根據周恩來提到的那些截獲得來的文件說，這些傀儡軍隊是要在日本的軍事力量遭達到災難時承繼日本人遺下的武器，軍火和供應。他們要以這些傀儡，在戰後的中國建立他們的第五縱隊。

如果日本人的計謀得逞，他們必會得到什麼呢？在什麼『循環』之下那些部隊能夠用來推進日本的——『民族救亡』呢？

第一，如果日本人慷慨地把作戰的物資接濟了他們，那末那可以使中國的內戰更加可能爆發。國民政府中的那些渴望儘快肅清共黨的反動份子底地位就會被傀儡中的反共健將大大加強。日本人的武器，軍火，以及供應品的繼承權利將使那些傀儡的將領在對抗國民政府政治或軍事會議中底『延安綏靖者』的時候，得到一個優越的討價還價的地位。他們甚至會以發動大規模的反共攻勢造成既成事實，然後使國民黨的正規部隊支持他們。

第二，由於共產黨力量的強大，內戰必然會很艱苦，很長期的。這一種內戰將自然而然地取消蔣委員長曾經答應了中國和協約國的：把國民黨政權開放。國民黨將加強和保全它那反動的特徵，而且使它具有一種更強烈的黷武色彩。

第三，爲了世界的和平，協約國也許會逼使重慶停止內戰，而這種行動是必然會受到國民黨的右翼反對的。協約國的壓力（即使還不致阻止接濟品流入國民黨的中國），更會加強右翼的國民黨陣營

中的反蘇偏見，和普遍的排外傾向。這也許會替日本企圖東山再起的第二個先決條件刷好一條道路：反動的中國政權愈來愈厭恨西方的列強而且愈來愈想反對他們了。

在協約國企圖阻止中國的內戰和栽培中國民主政治的同時，日本却想在國民黨中孕育排外的感情。這線索，如果拿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同盟社廣播的東京日本泰晤士報上的那一篇文章來說，是非常清楚的。

「美國企圖逼使重慶和延安合作的努力，」這篇社論說，「由於這二個政權所具有的根本不能相容的性格，將對重慶非常的不利。這二者的利益是不可能合而為一的，因為蔣介石的權力依賴着銀行利益的財力，大地主，一般的布爾喬亞以及官僚政客的支持——而延安的權力却基礎在革命的農業運動中生長，過激的理想家底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上面。」

「蔣介石悲哀了，因為他認識得很清楚，如果他依照美國的願望而與延安妥協，那無異允許了延安的戰馬躍進重慶的城垣。」

「如果（美國的壓力）最後終於使延安公然反抗了重慶，那末那也就是說，美國將來企圖在華中的經濟深入和剝削就可以受到更少的中國的民族主義的抗拒了。因為那終究是美國在華陰謀以及反抗日本——阻擋美帝國主義的亞洲選手——底最終目的。」

換句話說，日本以為祇有以內戰的手段打敗了共產主義才能使中國強得足以抵抗美國，帝國主義

的陰謀」。在重慶的某些反動的國民黨中間，這種觀點早已存在了。

在被佔領地區里的某些日人似乎早已發展了一串進一步的論點。他們主張在戰後日本的軍閥殘餘和中國的反動份子之間取得一種諒解。他們竭力想以「亞洲的反美帝國主義者底先鋒」來解脫日本對待中國的罪咎；他們竭力想以日本資本主義和官僚政治的腐敗解釋日本的暫時失敗。他們說，這種腐敗政治的存在破壞了日本亞細亞理想主義的性恪。失敗將使那種理想主義純粹起來。

中國因此也沒有什麼東西害怕日本的了。相反的，她必須和日本真正地合作起來反抗西方的共同敵人——他們使中國爲他們流了血，而且剝奪了中國戰勝了日本底果實。

就是以這種方式，日本人要想達到她那謀略的下一個階段——依照一九二一年訂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二個敵人之間的協定而訂立一個中日的「拉帕羅條約」。那就是說，勝利的，但是被內戰枯竭了的俄國，像中國一樣，雖然擁有廣大的人力和未被開發的自然富源，却無技術去加以利用；而戰敗了的德國呢，沒有這樣的財富，但有工業和軍事的技術去幫助俄國克服她的困難。

日本軍閥對於中日在戰後相互武裝的願望，在周恩來將軍告訴我的文件中間就有形蹟可尋了。

日本人好像祇要求一個交換條件就可以把武器，軍火，和給養留給「可靠的」僞軍了：那條件就是把某些日本的財產，機器，和技術專家安全地隱藏在中國……

我們必須估計到中國和日本之間某種合作形式的可能性。至於說到二個民族之間的仇恨，那末，雖然經過了許多年的衝突和戰爭，比起我們和日本或是我們和德國之間的仇恨來也許是較不長久的。

作爲一個民族來說，日本人之恨中國人民似乎並不像他們恨我們一樣。他們因此也許會把最後失敗的理由不歸諸於中國而歸諸於我們。另一方面，中國好像比英美有更多的人不害怕和戰後日本的一二集團合作，他們甚至還想把這種合作加以發展。在經濟上說，這二個鄰國有好多方面是相互補足的，而且還有機會在比戰前更大的規模之上互相從事有利的貿易。從文化上說，在他們兩者之間比較他們和任何西方的列強之間有着更多的相同之處。在這二個國家的反動份子是非常相像的路線思想的。在日本的自由主義份子獲得了更多的智慧和政治上的自由底時候，中日雙方的進步份子也許更是如此。在政治上說，那末這二個國家在戰後世界里的發展是相互依賴的。

如果單爲了這二者之間的地理上和文化上的接近，那末一個真正民主的中國比任何一個西方國家更能培養日本的真正民主。否則，一個反動的中國將使日本軍閥主義的根深蒂固的意識和組織更難——不管對我們自己和對日本的進步份子都是一樣——迅速地，澈底地毀滅。

反轉來也是一樣的正確。一個肅清了的日本，安全地步向民主改革的日本將會奪去中國反動份子可以在亞洲找到的唯一有力的幫手，然後在這樣地削弱了中國的反動派之後，就可以在她自己的民主進展中幫助中國了。

但是一個不完全民主的日本，一個受協約國的阻撓，而把人民反君主，反商賈，以及反地主主義

的發展壓制了下去的日本一定會加強中國的反動份子——與日本的反動派有着一種悠久的接觸和同情的中國反動份子。

中國和日本在政治制度上的相互影響，對於戰後亞洲的發展是有深遠的後果的。協約國必須將這個致慮來決定未來的對華對日的政策。

二 延安·莫斯科·和我們自己

亞洲俄國的領土魁梧地聳立在中國東北幾千英里的遼闊的邊疆上。也因為如此，在那些邊境的長城之間的中國底邊省都有着一種俄國影響的歷史。

在東部的滿洲——廣袤、豐盛，人煙稠密，直至日本驅走了俄羅斯人，先而變成了這地方的索取者，繼而又變成了這地方的佔領者之後，才脫離了沙皇的統治——將再一次地見到俄國的部隊踏在它的土地上，如果俄國加入了反日的戰爭。

在中部的外蒙古——一塊廣大的領土，由蒙古的遊牧民族散居着，從未被他們所恨的中國軍閥有效地統治過——在俄國的內戰時期變成了一個自治共和國，然後又變成了蘇俄反日的同盟和緩衝。

在西部的新疆——高大而乾燥，居住着少數外來的回民——近年來愈加和中國疏遠，而和俄國親近，而且直到二三年前，還在俄國的影響之下。

在心臟部的華中和華北，有廣大的地域是在延安的共產黨手下；北邊鄰近俄國控制的外蒙古，東邊直達俄國軍隊起來打擊日本的地方。

這一幅明細的中俄政治地圖——正確而易被誤解——常被利用來使人相信下面的指摘：莫斯科出兵統治中國，而且在物質和道義上支持延安了。俄國干涉了中國的內政。中國的共產黨是他們的附庸，準備把莫斯科所要併吞的任何領土交給他們的俄國同志。反蘇和反中共的世界民主戰線是拯救亞洲和世界赤化的唯一辦法。

在中國和俄國的共產黨之間是些什麼關係呢？

有好幾次，重慶政府的負責官吏們告訴我，他們對於蘇俄給於中共的物質接濟從未得到過什麼證據，甚至從未有過鄭重的懷疑；據他們所知道，在延安和莫斯科之間是沒有什麼關係存在的，有的話，可能祇有無線電上的接觸而已。

在莫斯科和延安控制的領土之間，陸上交通好像真的是不可能的。一個遼闊的沒有路的，半沙漠的地帶——深達幾百至千里左右——把俄國控制的外蒙古和作者延安抗日根據地和邊區底屏障的內蒙古分了開來。